

# 翰墨与道德

— 论真德秀重主体品格的文艺思想 —\*

杨万里\*\*

## 目 录

- 一、引言
- 二、翰墨品格余人之德性
- 三、翰墨技艺有助道德学问之传远
- 四、对文人诗文的义理阐释与道德规约
- 五、结语

## 一、引言

随着理学思潮的演进，精于文人新“六艺”的理学家逐渐增多。他们在文艺创作与批评以及经典阐释的过程中，流露出大量颇具特色的艺术见解与理论主张。南宋大儒真德秀继承朱熹的艺术精神并有所推进，形成更为“正宗”的理学文艺观。他对艺术作品道德教化价值的推崇与对艺术审美层面的进一步贬低，使其文艺思想显得有些保守与偏执。但这也正体现着理学文艺思想的基本特色，成为我们探究南宋理学文艺思潮的重要关注对象。

真德秀（1178—1235），福建浦城人，原名实夫，后改为德秀，因晚年曾隐居家乡的西山著述讲学，学者称之为西山先生。他早年从学于詹体仁，热衷朱熹义理之学，于庆元五年（1199）与魏了翁同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后正直敢

\* 基金项目：2016年度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宋金元理学家文艺思想研究——以书画理论与诗学思想为中心”（2016213）

\*\* 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

言，政绩卓著，官至参知政事。其思想既深受朱学影响，又有明显心学倾向，被视作朱、陆合流的开端者<sup>1)</sup>。但作为朱熹的再传弟子，朱学对其学术思想之影响更为深刻，以致被黄宗羲评价为：“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sup>2)</sup>正因真德秀对程朱理学精神的坚守与推崇，才使理学得以官方化，并进而确立了在宋末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真德秀直接的文艺理论并不多，前人主要于其《文章正宗》的编选旨趣探讨其文学观念，却忽视了他文集中序跋的理论价值，尤其对他的书帖题跋缺少应有重视。他在题跋前人书法墨迹时，批评视角和审美旨趣等均与其诗文评论可以互相参照。即重视作品道德教化价值而贬抑艺术价值，又必论及主体的心性修养及作品的学问义理。主张翰墨<sup>3)</sup>品格与主体的道德学问融合一体，相得益彰。本文即以真德秀对书法墨迹的题跋为主，结合其对于诗文的评价，综合探讨其重主体品格的文艺思想。

## 二、翰墨品格关人之德性

真德秀秉承了朱熹以人品定文品的文艺批评原则，认为只要作者的道德事业显著，自然会提高其诗文与书法墨迹的收藏价值，而这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价值

- 1) 台湾学者甲凯认为：“西山心性之学出自程朱，略参考陆象山”。蔡仁厚则引述全祖望之语指出：“西山曾问学于象山门人杨慈湖。今检之于《真德秀年谱》，确有其事。且《文集》卷三十五《跋慈湖先生行述》：‘先生之于某，可谓爱之深而教之笃矣。’”（《宋明理学·南宋篇》，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81页。）日本学者冈田武彦也认为：“朱子再传的真西山，重视朱子学的存养方面，形成具有接受容纳陆子心学的倾向。”（《关于宋明儒学思想发展动向的一个考察》，《哲学译丛》，1988年第2期，第25—35页。）
- 2)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96页。
- 3) 翰墨：笔墨。汉张衡《归田赋》：“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后借指文章书画。曹丕《典论·论文》：“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即指文章或文辞意。《宋史·米芾传》：“特妙於翰墨，沉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以上节选自《汉语大词典》）本文中所谓“翰墨”即兼指诗文、书法而言之。

而非艺术价值。正如孙先英先生所说：“真德秀有关诗文鉴赏的理论并不多，但都颇有见地。其鉴赏常因文及人，以人品涵盖文品，以道德包容艺术。”<sup>4)</sup> 可谓的论，虽针对其诗文鉴赏而言，实则亦可推及书画技艺之事。如他在《跋宗上人藏杨文公刘宝学朱文公真迹》中说：“宗上人自径山归闽中，出示杨文公、刘宝学、朱文公三帖，喜津津满眉间曰：此希世之宝也。”<sup>5)</sup> 此并非因其书法艺术成就之高，而主要是缘于杨亿、刘子翬、朱熹等人品之高与道德事业之著。

真德秀认为文艺风貌与品格高下决定于人之气性。在《日湖文集序》中，他有一段精彩论述：“所谓祥顺之人，其言婉；峭直之人，其言劲；嫚肆者，无庄语；轻躁者，无确词；此气之所发者然也。”人之气性不同，言词之风格亦如其为人。此并非泛泛而论，而是有着气本论的依据，后文将有详细阐释。他又援引王通之语曰：“文士之行可见。因枚数而评之曰：‘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哉思王，其文深以典。至于狷也、狂也、夸也、诡也，皆以一言蔽其为人。’”此段论说较为著名，出自王通的《中说·事君篇》。其中遍论南朝文人之德行进而定其文格之高下，认为谢灵运等“皆古之不利人也”，其文之格亦随之卑下；较为满意者只有颜延之、王俭、任昉，因其“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sup>6)</sup> 对此真德秀颇为认同，他感慨道：“夫文者，技之末尔，而以定君子小人之分。何耶？抑常思之，云和之器不生茨棘之林，仪凤之音不出乌鸢之口。”<sup>7)</sup> 他在《跋梅溪续集》中也阐发过类似的论调：“盖公之为，襟度精明，表里纯一。其立朝事君，空臆尽言，攫龙鳞而不悔者，此诚也。居官牧民，矜怜摩抚，若父母之于赤子者，此诚也。至于为诗与文，绝去雕琢，浑然天质，一登临，一燕赏，以至赋一卉木，题一岩石，惓惓忠笃之意亦随寓焉。呜呼贤哉，宜泉人之咏叹而不忘也！”此处“梅溪”是南宋诗人、爱国名臣王十朋的号，《宋史》有其传记。因素负大节、立朝刚直、治绩卓著，被

4) 孙先英：《真德秀学术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

5)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

6) 阮逸注：《文中子中说》卷三《事君篇》，《四部丛刊》本。

7)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八，《四部丛刊》本。

后人广泛称颂。曾于泉州知州任上离开时，受到当地百姓遮道断桥以挽留，其去世后亦引起泉州民众会集悼念并为之建祠。真德秀“宜泉人之咏叹而不忘”之语即指此也。而其“惓惓忠笃之意”一寓之诗文，其自具宝藏之价值。因此他指出：“虽弄翰戏墨犹当勤勤收拾，而况藹然仁义之言，皆有补于世教者乎？”<sup>8)</sup>

心术不正、品节不佳之人是真德秀所深恶痛绝的，同时他们的作品因无道德价值之支撑，其艺术价值亦不足为珍。《鹤林玉露》曾载这样一段话：“东山先生杨伯子尝为余言：某昔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官，尝至某位中，见案上有近时人诗文一编，西山一见掷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问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笔头虽写得数句诗，所谓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读之将恐染神乱志，非徒无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谢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晋公、王岐公、吕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辈，亦非无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sup>9)</sup>由此可见，真德秀对于文人德行十分看重，认为本心不正则人品不端，读其文非但无益且恐有害心志。历代文人之操守略有瑕疵者即成为他攻击的对象，其态度颇为严苛。如对一代文豪柳宗元和元稹之批评：“盖自昔文人鲜顾检操，以柳河东之艺且贤，而甘心自附于佞文之党。元才子始为御史，号称劲挺，晚节顾由敕使以进，青蝇集瓜之消，羞辱亡穷焉。”<sup>10)</sup>柳宗元曾依附二王以进身，元稹则靠攀附宦官以知制诰，从而遭武儒衡之鄙夷。真德秀认为，柳、元以及宋玉、司马相如等人虽有文名，而无德行，皆所谓“离道而为文”。值得注意的是，重视人品，甚至以道德标准代替艺术标准，是理学中人评论文艺的普遍倾向。如与其并称于时的魏了翁，就《续诗选》的编选标准答复友人时亦强调：“是书之作，当以铨品人物为上，而语言之工者次之。”<sup>11)</sup>与真德秀《文章正宗》之选文标准若合符契。

由人而知文的另一个维度即观文可以见人。真德秀对王通“文可观人”的批评理念十分赞同，曾于序跋他人文集时多次援引。在《跋王双岩文集》中他说：

8)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9)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3-194页。

10) 《江峰文集序》，《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五，《四部丛刊》本。

11) 魏了翁：《答名山张监茶》，《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三，《四部丛刊》本。

“予读双岩先生集，其论理道不颀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不深泥老佛而间发老佛之微。其古赋似东坡，诗歌似太白。其辞不矫抗而健，不凋镂而工，不组绣而丽，信乎其伟于文者也。昔河汾王氏谓文士之行可见，今即双岩之文，而想其为人，其殆易直慈良，郁乎若春者也；绸缪于君亲之义，而惻欵于骨肉之情者也；群居族处，和不流、峻不激，举觴命侣，风流娴雅而不跌宕于绳尺之外者也。”<sup>12)</sup> 即其文而想其为人，如在目前。

文（艺）可观人，进而可以观世。在《南轩东莱帖跋》中，真德秀详尽阐述了帖中所涉君臣之德行，彰显了南宋孝宗淳熙年间的盛明世风：

南轩先生帖当在以郎官兼侍立时，方发运司之置也。一时贤士大夫争议甚众，先生亦因对及之至是，遂罢去。自昔儉人图进用必以功利中时君之欲，故谏者莫能入。惟孝宗天挺圣哲，闻善若决江河，用能斥去聚斂之臣如弃涕唾。帖中所谓上聪明能受尽言，谓此也。东莱先生二帖，其一为博士太学时，其一自太学分教严陵时。盖先后年间尔。是时中外多君子，二先生帖所谓圣锡者端明汪公，谦之者艾轩林公，元晦者新安朱文公。而周洪道之特立，丘宗卿之尽言，赵子直之好学，亦见帖中，皆当时名流也。主德盛明，贤才林立，犹阳春正中，风日怡畅，奇葩异植，纷翥天壤间，此其所以为淳熙欤？慨慕之余，敬再拜，而书其后。<sup>13)</sup>

可见，真德秀所跋书帖之可贵，非仅因其承载张栻、吕祖谦二先生之贤德。更重要的是，其中体现出孝宗之天挺圣哲，亦广涉淳熙间汪藻、林光朝、朱熹等贤良君子。使人见帖则可感雍雍和畅之士气政风，此其帖宜因人因世而可敬可贵也。

以上所论，可见翰墨品格关人之德性，此论断之根据主要源于真德秀对前人“文气说”的继承与发展。“文气”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术语。从曹丕《典论·论文》首次提出“文以气为主”，到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韩愈的“气盛言宜”（《答李翊书》），再到苏辙的“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上枢密韩太尉书》）等，逐渐延伸至本体论、主体论、创

12)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

13)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五，《四部丛刊》本。

作论、风格论、鉴赏论等方方面面。在此基础上，又生发出欧阳修“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书》）等以人论文的基本观念。宋代理学家张载、朱熹、真德秀、王柏等对理气哲学的推进深刻影响了“文气说”的发展，使文气之间的辩证关系更为明确与深化。就真德秀而言，他将一切文艺活动的生成均归因于阴阳二气。他论礼乐之生成曰：“阴阳五行之气，流行于天地之间，未尝止息。相摩相荡，若雷霆之鼓动，风雨之散润。二气和合，故能化生而不穷。圣人因之作为之乐，有五声，有十二律。角徵阳也，宫羽阴也；六律阳也，六吕阴也，混合无间而乐成焉。故能与天地之和相应，此乐之所由兴也，知乎此然后识礼乐之原矣。”<sup>14)</sup> 不仅礼乐为天地间阴阳之气流行化育而成，诗文书画等皆如是。在《跋豫章黄量诗卷》中，他又援引唐人贯休“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之语，提出诗歌乃乾坤清气之化育：“予谓天地间，清明纯粹之气，盘薄充塞，无处不有，顾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为德，材士得之以为材，好文者得之以为文，工诗者得之以为诗，皆是物也。”<sup>15)</sup> 人的气质之性与诗文，皆禀于气而成。气有清浊，人之所受不同，则由才德以至诗文字画亦会随之而出现差异。在《赠相字郭道人序》中真德秀认为，相字可见人之吉凶，前提则是观字可以见人之气性。他说：“世间万法不出阴与阳。以字画求之，凡其清者劲者为阳，浊者软者为阴。竖则上阳而下阴，衡则左阳而右阴。即阴阳而视强弱，吉凶判矣。非惟字画为然，凡世之所谓技术若筮与卜、相与命莫不然。非惟技术为然，自吾一心之正邪，推而至于世道之泰否，亦莫不然。”<sup>16)</sup> 字画之阴阳清浊，即源于作者内在所充养之气，盖“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语）。气之清则强，气之浊则劣，观字而见人之气性，以人之气性而证其吉凶。进而人心之正邪，世道之泰否，皆可由气以观之。

因此，真德秀又提倡以养气为主的主体修养论。既然气质之性决定了文艺作

14) 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4页。

15)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16)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九，《四部丛刊》本。

品的外在风貌，那么要想写出清绝优秀的诗文，首先需从变化气质之性开始。他在《大学衍义》中说：“盖天之所以与人者，莫非纯粹至善之理，此所谓天地之性也。人受之则所禀之气不同，或清而纯，或浊而杂，故其性亦随而异，此所谓气质之性也。天地之性则无不善，气质之性则有善有不善焉。然苟有以反之，则虽不善者可复而善，然则反之道奈何？曰：由治己而言，则有学；由治人而言，则有教。闲邪存诚，克己复礼，此治己之学也。学之功至，则己之善可复矣。道德齐礼，明伦正俗，此治人之教也。教之功至，则人之善可复矣。”<sup>17)</sup>可见养气之前提是养心，心之正邪决定了其对所禀之气的选择：“《诗》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玉瓚至宝也，黄流至洁也，夫必至宝之器而后能受至洁之物。世人胸中扰扰，私欲万端，如聚蛭虻，如积粪壤，乾坤之英气将焉从入哉？故古之君子所以养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虚必明。惟其正也，故气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虚也，明也，亦然。予尝有见于此久矣，方其外诱不接，内欲弗萌，灵襟湛然，奚虑奚营。当是时也，气象何如哉？温然而仁，天地之春；肃然而义，天地之秋。收敛而凝，与元气俱贞；泮涣而休，与和气同游。则诗与文有不足言者矣。”<sup>18)</sup>由养心以养气，从而发溢于外在的文艺气象。因此，作者需养之于清气，所谓“清气不入其中，则虽求片言之有味且不可得，况能摹写大化，罗络万象，道人所不到者乎。”<sup>19)</sup>

### 三、翰墨技艺有助道德学问之传远

真德秀虽认为人之德性决定翰墨之品格，但并不否认翰墨技艺之高明，对于诗文甚至道德学问的传远还是颇有益助的。如他在《跋朱文公所书谏议马公诗》中指出：“此诗赖朱文公亲书，遂传不泯。某旧得之建安叶氏。会公四世孙

17) 真德秀：《大学衍义》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0册，第547页。

18)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19) 《跋郑大惠饭牛集》，《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承直郎淮来丞南浦，见之愀然，请刻石置厅壁，亟以授之。呜呼！公于中庸之道所得至深，而诗之末句犹以未死自期，盖理无穷，学无止，自昔圣贤所为，乾乾终日死而后已者也。公虽竟以谪死，而英风毅气今犹生存，学者观此可以得师矣。”<sup>20)</sup> “马公”即指马伸（1078-1128），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曾因反对张邦昌称帝，并“首具书请邦昌速迎奉元帅康王”而为朝野称颂。高宗即位后，“知其有忠力于国，擢殿中侍御史”<sup>21)</sup>。又因其得程颐亲授《中庸》之学，而成为南宋时期理学传播之重要人物。朱熹亲书其诗，遂令广传。而马公的学问道德，亦借后人观赏朱子墨迹之机，得以彰于后世。同样在《赠萧道士序》中，真德秀先是对萧道士萧散清绝的襟怀韵度给予了盛赞，接着说：“余素不善书，诗与序既成，以授笔史书之。视子默之色，若有不怪然者。予友金华王子文桎偶留西山，慨然为余书之，笔力清劲可喜。予文不足道，安知不藉是以传乎？”<sup>22)</sup> “素不善书”之说自是真德秀之谦辞，但无论是萧道士对其笔墨的期许，还是他对友人书法笔力之称美，均示显出翰墨技艺对人物风神与诗文辞章之传远的重要意义。

借他人高妙之书艺尚可助于诗文与主体品德的彰显，那么如果在作者学问德性培养深厚的情况下，又能兼善书艺，则书法墨迹与其学问德性往往能相得益彰。在《跋陈北山帖》中，真德秀即盛赞陈孔硕翰墨与心性表里如一：

北山先生陈公，辞章翰墨为近世第一。此其未五十时书也，笔势遒美已如此。至晚岁则犹龙腾虎踔，不可搏执矣。予尝见公所作《赣州三桥诗》，又自书而篆之。每叹息，以为《袁州学记》号称三绝，然非一人之手，而公独兼之，岂可及哉！此帖与建阳陈君朝瑞，盖公同门友也。是时伪学之论方哗，文公先生力请致厥事，庙堂未之许，帖中所及正指此也。后十余年，天子始诛权臣，而文公与朝瑞久已仙去。独北山年几八十，尽见更化后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变所守。高卧不出，以眉寿终。帖中所谓不易初度，此其素心也。<sup>23)</sup>

20)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

21) 脱脱等撰：《宋史·列传第二百一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363-13368页。

22)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八，《四部丛刊》本。

23)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

陈孔硕在当时不仅极有诗名，且工于书法，刘克庄称其“楷篆极妙”<sup>24)</sup>；朱衡的《道南源委》亦谓其“雅工篆隶”<sup>25)</sup>。他又常出入理学，从朱熹、张栻、吕祖谦等人游，其学问德性为时人推赏。真德秀的跋文道出了陈孔硕书艺与词章兼善对其学问德性的彰显作用。

前贤手泽之所以比书法匠人的作品更受到真德秀之青睐，就在于览墨迹有与书家会面之感，因此笔墨真迹成为后学瞻仰圣贤气象以寄托敬慕之情的载体。张怀瓘在《书断》中曾指出过书法的这一特殊作用：“若乃思贤哲于千载，览陈迹于缣简。谋猷在觐，作事粲然，言察深衷，使百代无隐，斯可尚也。及夫身处一方，含情万里，标拔志气，翻藻情灵。披封睹迹，欣如会面，又可乐也。”<sup>26)</sup>可见，后人在不得一睹前贤德容的憾恨中，唯有以充溢着圣贤亘古不变之真气的书画为媒介，来慰藉自己思慕圣贤之情结。这也是真德秀题跋前贤墨迹的主要心态。他在《跋蔡忠惠帖》中说：“蔡端明帖藏余于舒氏，后有赵忠定公题字。读之如见两贤面目，真可宝哉。”<sup>27)</sup>又如在《题李果斋所书郑伯元诗后》中也明确表达了这种心迹，他说：“予与公晦为僚于泉山，二年之间，于学问文章源流几亡所不讲。独罕言诗意，其未暇属意也。……耘叟笔力超跋，甚似其兄。见之如见公晦，令人怆然兴九原之悲云。”<sup>28)</sup>览迹以追忆，前贤情态跃然纸上。笔墨自身又透溢出书者的学问修养，故而览其笔墨的同时亦可洞察其笃学不倦之精神品格。在《跋汤士恭手书周易诸经》中西山盛赞汤君：“以八十余老，不缘朝廷之命，不惮翰墨之廛，尽写诸经以及《论》《孟》，亡轶遗者。非其笃学嗜古，白首弥励，畴克逮此？……然君不以连蹇故而倦于笔墨，此其所以尤可贵欤。”<sup>29)</sup>而先人手书又是其本心的承载，故而后人见之如会其面的同时更要了悟其良苦用心。真德秀在《郑居士手写古文〈孝经〉》中

24) 马宗霍辑：《书林藻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44页。

25) 师勉之：《中国历代书法谈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210页。

26) 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54页。

27)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

28)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五，《四部丛刊》本。

29)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五，《四部丛刊》本。

说：“居士郑公居其父丧时，手抄此经。遵守惟谨，可谓笃志力行之士。方其落笔时，用纸盖不暇精择，此岂有意于传哉？距今八十有五年，蠹蚀之余，墨色如新，使人捧玩起敬。为善之不可揜若此。呜呼！昔人于其先一器一物犹谨而藏之，况此编居士之心在焉。主簿君孝且贤，宝之以传于后，使郑氏子世为笃孝之门，岂不休哉。”<sup>30)</sup>郑居士笃孝之心，亦是凭藉其笔墨真迹得以代代相传，郑氏子孙之孝且贤盖得益于此也。此又见西山先生有补世教的文艺观念。

真德秀所欣赏和题跋的书帖，往往出自精忠大节之人或理学大儒之手。他们的墨迹为世人争相宝藏，其高尚德性与深厚学问即借此受到更多人的传颂与敬仰。如他在《题刘静春与彭止堂帖并彭仲诚墨庄五言诗后》中云：“静春之学，穷幽探微。止堂之节，星日同辉。惟仲诚父，示余斯帖。使我慨然，兴怀前哲。清泉鉴物，菡萏浮香。我读君诗，如游墨庄。老成云亡，典刑犹在。尚为斯文，努力自爱。”<sup>31)</sup>刘静春即刘清之，为政廉洁奉公，救荒利民，其对儒家义理之学又深有研究。《宋史》称其：“既举进士，欲应博学宏词科。及见朱熹，尽取所习焚之，慨然志于义理之学。吕伯恭、张栻皆神交心契，汪应辰、李焘亦敬慕之。”<sup>32)</sup>此即真德秀称赏其“穷幽探微”之义。他对湖湘学者彭龟年也是十分敬仰，不仅为《忠肃文集》作跋时推赏其“以濂洛为师”，还盛赞其文为“鸣道之文”而非“文人之文”。在此跋中又着重彰显其品节。彭龟年为政期间直言敢谏，深明大义。《宋史》称：“龟年学识正大，议论简直，善恶是非，辨析甚严，其爱君忧国之忱，先见之识，敢言之气，皆人所难。晚既投闲，悠然自得，几微不见于颜面。自伪学有禁，士大夫鲜不变者，龟年于关、洛书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训蒙》，盖始终特立者也。”<sup>33)</sup>其死后被谥为“忠肃”，宁宗许其“忠鯁可嘉”，宜西山称其与“星日同辉”。可见真德秀题跋此帖正源于二公之德性与学问。在《二吴公帖》中西山则明确指出，只要作者“清名亮节”为人敬仰，则其遗墨败楮宜为世人争相宝之。其论吴正肃赏其“精忠大节”，

30)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五，《四部丛刊》本。

31)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32) 《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第12956页。

33) 《宋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二》，第11999页。

又谓吴正宪“忠诚为国”、“阴护正人，力扶公论”，“清名亮节皦如白日，遗墨败楮，人争宝之。其视鬼蜮之徒身死名灭，与鼠狗不异，是果孰为得失邪！”<sup>34)</sup>即使在跋书法大家颜真卿的《论座帖》时，真德秀也并非对颜鲁公笔法之精绝加以注目，而是着重赞其凛然气节：“仆不娴书学，未能辨其为第几帖。独观公秉礼陈义，以斥英义之骜，而折朝恩之骄。论正气严，凛凛冰雪，真可畏而仰也。”<sup>35)</sup>

真德秀对理学大儒讨论学问义理的书帖墨迹兴趣十足。在题跋这些书帖时，他致力更多的是对帖中学问义理的申发阐释。理学中人大都善书，如胡安国、张栻、吕祖谦、朱熹、杨简等人均有书名，不过皆被其学术成就所掩。加之他们自身也并不以书法家自我期许，故而后人对他们的书法成就有所忽视。真德秀对这些理学大家的墨迹十分欣赏，而且更侧重对其内蕴的发掘，如此一来他们的翰墨真迹也便有助于其道德学问的传远。如在《吕子约与彭仲诚帖》中称道其讲学意旨：“其论读《明道行状》，可以观圣贤气象。读书以《论语》为主，履践以毋自欺为本。富哉言乎！”<sup>36)</sup>真德秀题跋次数最多的还要属学问德性与书法成就均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朱熹。不过他对朱熹笔墨技法层面并没有多少评述，而是借题跋其墨迹之机着意对书帖中所含义理进行阐发。如其《任汉州所藏朱文公与南轩先生书帖》说：“二先生更相师友，以斯文为己任，一言论，一著述，反复讲磨，必极其至当而后已。”又申发帖中旨意云：“此帖所谓发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载之后，而接孔孟不传之统，信天之所畀矣。二先生并时而出，讲明斯道，以续周程之正脉，谓非天意可乎？虽然，天非独私于二先生，二先生亦未尝以自私也。学者诚能因其言以求其心，繇下学之功，驯致于上达之地，则道在我矣。若曰二公天人，匪学可到，习卑守陋，姑以自贤于世俗而已，岂惟非二先生之心，实有负于天也。文公有不谓命之云，意或在是，故并及之。”<sup>37)</sup>真德秀一生服膺朱熹学问，在他看来虽其只言

34)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35) 《颜鲁公与郭定襄论坐次帖》，《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36)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37)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片字，皆有益后学。因此他认为收藏字帖者应将其中之言视为格言大训加以遵守，而后人在观赏其遗墨时，也需涵泳其言以助于自身的学问修养。其《跋朱文公帖》，不惟彰显朱熹“作经之心”，且称赏了詹体仁在“群邪峥嵘，设为党禁，网天下士，凡先生片文只字所在，毁掷删弃惟恐后”的境况下，依然能“刊先生（朱熹）所定经文于学，不少顾避，其尊闻行知，不为祸福所移夺”<sup>38)</sup>的精神气节。

#### 四、对文人诗文的义理阐释与道德规约

对于理学大儒的书法墨迹，真德秀或重在阐发其内在义理，或着意彰显其治学精神，而对外在的艺术表现却几乎不做评价。这与其对诗文的批评原则也是若合符契的。他不仅以义理解读书帖墨迹，且以义理解诗。如他在《跋萧定夫所藏胡文定碧泉诗卷》中说：

碧泉诗卷才数纸尔，而胡氏父子昆弟师友手泽皆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学，赖龟山杨氏传之而南。文定得之以授五峰，五峰传之南轩，其道益以光大。此卷诸诗虽为泉流而作，然玩其辞意，则师友间授受之微旨有蔚然可见者，非寻常赋咏比也。萧君其尚宝之哉！<sup>39)</sup>

胡安国书法造诣颇高，刘子翬曾在观文定公手墨时赞道：“温温文定公，至道夙所钦。神超虽缅邈，余英壮儒林。正容阅真翰，默默流至音。不事八法奇，天成写幽襟。有如瀚海鸿，随波自浮沉。又如太虚云，舒卷杳莫寻。”<sup>40)</sup>足见其书法乃自胸襟流出，自由挥洒，自成一家。而真德秀在跋此帖时着意对湖湘学术的承传脉络加以揭橥，以彰显胡氏一门发扬伊洛之道的学术功绩。并从

38)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

39)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40) 刘子翬：《观胡文定公手墨因求别本》，《屏山集》卷十四，明弘治十七年刻本。

《碧泉诗卷》中体会出师友间授受学问之微旨，而不以寻常赋咏视之，又见西山以义理解读学者之诗的阐释特点。同样在《跋南轩先生送定叟弟赴广西任诗十三章》中，真德秀对张栻诗歌也作了义理阐释：“《棠棣》之作，至今余千载矣。蔼然忠厚之情，惻然闵伤之志，读者犹为兴起。南轩先生此诗于怡怡之中，有切切偲偲之意。虽使不令兄弟观之，友弟之心尚当油然而生，况绰绰有裕者乎？真迹今藏宋正父家。余观正父与愿谦二弟诗，皆睠焉有前修风味，所谓亦能踵之者邪？”<sup>41)</sup> 张栻和宋正父的与弟诗皆情意蔼然，《小雅·棠棣》之遗风在焉，可谓形于中而发于外者也，尤能兴起观者友弟之心。真德秀又在《罗氏六有斋诗》中援引朱熹之语，阐发诗中所含学问修养之工夫曰：“君子终日乾乾，不可食息间。亦不必尽日读书，或静坐存养，皆是用功处。天地生物，以四时运动。春生夏长，固是不息；虽秋冬凋落，生意未尝不在其中。学者常唤，令此心不死，则日有进。”<sup>42)</sup> 重视义理是真德秀诗学阐释的一大特色，与其“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门理义之秘”（《咏古诗序》）的创作观念正相照应。亦是魏了翁等理学家诗学阐释的共同特征<sup>43)</sup>。

除以义理解读学者之诗外，真德秀还试图以儒学义理来阐释一些以文名家者的诗文学作品。力求将其从传统视域下的“文人之文”扭转为“鸣道之文”，从而将之导入合乎理学审美标准的接受路径上来。这突出表现在他对陶渊明与杨亿等人诗文学作品的评价中。陶渊明以自然平淡的诗风与宁静淡远的人格为后人推崇，传统接受视域中普遍认为其人其诗主要受庄老与玄学之影响。而理学家在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接受与批评过程中，却主要彰显其忠义精神与儒家义理。真德秀对陶诗的阐释较有代表性，他在《跋黄瀛甫拟陶诗》中说：

予闻近世之评诗者曰：渊明之辞甚高，而其指则出于庄老。康节之辞若卑，而其指则原于六经。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

41)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

42)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五，《四部丛刊》本。

43) 请参拙文《魏了翁根柢于“义理”的诗画观念》，《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

《饮酒》末章有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渊明之智及此，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邪？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或者徒知义羲以后不著年号，为耻事二姓之验，而不知其眷眷王室，盖有乃祖长沙公之心。独以力不得为，故肥遁以自绝。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顾读者弗之察尔。渊明之志若是，又岂毁彝伦、外名教者可同日语乎？三山黄君瀛甫，拟作陶诗，优繇澹泊，味出言外，盖所谓寤寤迫真者。予尝病世之论者，于渊明之蕴有所未究，故以是质之，而未知其当与否也。瀛甫其有以起予哉！<sup>44)</sup>

真德秀指出，陶渊明之学从根本上乃渊源儒家圣人经术，并非世人所归属的庄老之学。并举其《荣木》、《咏贫士》、《饮酒》、《读山海经》等诗为例，与儒家义理相比附，以证其与儒学之渊源。陶渊明又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对其归隐真德秀创造性地指出，其归隐田园乃是心怀王室而力不能至的“避人之隐”，而非“毁彝伦、外名教”的“避世之隐”。在《跋龚尉所记全氏心远室》中，西山又援引胡安国之语对陶渊明“心远”之义释之曰：“莫为婴儿之态，而有大人之器；莫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志；莫为终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此之谓心远。”对此说法真德秀推崇备至，接着他说：“今人局迫樊笼中，所见不逾寻丈，所志不过锥刀。焉足以语此？欲学渊明者，当即胡公之言求之。”<sup>45)</sup> 可见西山所极力推赏的正是渊明“遗宠辱、一得丧”的孔颜乐处的圣贤境界，这就将陶渊明诗歌与人格形成的思想基础完成了由庄老向儒家（进而是理学）的转化。因此，陶诗成为真德秀标榜的主要对象。以《文章正宗》而言，“诗歌”一门的编选任务曾交付刘克庄，但据《后村诗话》所云：“凡予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诗甚多，如三谢之类多不入。”<sup>46)</sup> 最终，在真德秀的主导下，《文章正宗》选入陶诗多达四十九首，相当于唐前其他诗歌之总

44)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

45) 《跋龚尉所记全氏心远室》，《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

46)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七，《四部丛刊》本。

和。

此外，对杨亿等以文名世者，真德秀倾向于淡化其文名，以彰显其德性。其《杨文公书玉溪生诗》云：“此吾乡文公书也。……公之文章擅天下，然使其所立独以词翰名，则亦不过与骚人墨客角逐争后先尔。惟其清忠大节，凛凛弗渝，不义富贵，视犹涕唾，此所以屹然为世之郭郭也欤！”<sup>47)</sup> 再如他在跋陈俊卿的诗集时同样不彰其诗名而显之以德，文章开始先以韩琦与司马光为例指出：“韩忠献公不以诗名，而咏雪之句屹焉，有扶九庙奠八极气象。司马文正公自谓平生于诗尤拙，而《归田》、《花庵》等作至今想见其深衣独乐之风流。然则谓二公不能诗固不可，谓二公有意于诗亦不可也。”<sup>48)</sup> 进而指出陈诗有“二公之风”，“娱戏翰墨亦皆蔼然仁义之言”无非“积中形外”之体现。

当然，以诗歌形式阐说理学义理的诗学思想，除在理学家的诗歌阐释观念上有所体现，在真德秀等人的创作论中亦有贯注。对此学界多有论述，此不赘言<sup>49)</sup>。

## 五、结语

在理学语境中，诗文书法均为技艺之事，游之可也，所谓下学而上达也。因此理学家主张翰墨技艺关乎道德事业，而非徒论其工拙而已，遂逐渐将文学艺术纳为道内之事。反映在文艺批评上即以道德标准去统摄艺术标准，强调“文以载道”之传统。真德秀学宗朱熹，其评文论艺亦承传朱子重主体品格的文艺精神。他在题跋诗文书帖时，批评视角主要坐落在作品的内在意蕴上，即重在发掘作品中的学问义理，标榜作者的德性修养。认为艺术作品之价值主要体现为道德教化而非艺术审美。因此，作者之道德事业显著，可提升翰墨品格，从而

47)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48) 《跋陈正献公诗集》，《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

49) 如张文利、陶文鹏：《真德秀与魏了翁文学之比较》，《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石明庆：《论真德秀的诗歌理论批评》，《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形成以人论艺的批评观念。反过来，翰墨技艺可承载道德学问，助其传远，扩大其有补世教之意义。他对陶渊明、杨亿等其人其诗的阐释，亦体现出有别于传统文人的道学性格。总的看来，他主张翰墨技艺须与作者道德学问相得益彰，进一步塑造了理学文艺观念的基本精神。

理学家是宋明时期一股重要的文学力量，其文艺理论与同时期的文人士大夫相比特点鲜明，自成体系。一直以来，理学家的文艺成就被其学术思想所掩，缺少应有重视。而且，理学家对文艺主体德性修养的重视，对艺术作品经世致用功能的推崇，均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优秀传统，需要我们予以深入挖掘与彰显。

## 参考文献

-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
- 真德秀：《文章正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真德秀：《大学衍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孙先英：《真德秀学术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四部丛刊》本。
- 刘子翬：《屏山集》，明弘治十七年刻本。
-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文集》，《四部丛刊》本。
-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蔡仁厚：《宋明理学·南宋篇》，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
- 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阮逸注：《文中子中说》，《四部丛刊》本。
- 马宗霍辑：《书林藻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 师勉之：《中国历代书法谈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 张文利、陶文鹏：《真德秀与魏了翁文学之比较》，《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 石明庆：《论真德秀的诗歌理论批评》，《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Abstract

The Art and Moral

-- Zhen Dexiu's Literary Thought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Writer's Character

Yang, Wanli

Study of Zhen Dexiu's literary thought has always been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especially the calligraphy inscriptions. Zhen Dexiu basically stuck to the spirit of Zhu Xi's thought, and on the basis he made a further development, the formation of more "authentic" Neo-Confucianism thought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his view, calligraphy and writer's moral was an organic whole, the two could complement each other. His criticism on calligraphy and poetry,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work content and the writer's moral character, less on the art skill of works. Based on this, he also try hard to interpret the poetry and personality of Tao Yuanming, Yang Yi and so on, who were known by his poetic prose, in the sense of Neo Confucianism. He respected the value of moral educ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meanwhile further degraded the level of aesthetic artistic, his thought of literature and art seem conservative and paranoia, also embodying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 the Neo Confucianism literary thought.

Key words: Zhen Dexiu; literary thought;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calligraphy; moral and knowledge

투 고 일 : 2017. 4. 10. / 심 사 일 : 2017. 4. 15. ~ 2017.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7. 5. 20.